

通俗文艺小丛书



· 革命斗争回忆录 ·

一颗红心

陈兰琴 讲述

李良友 整理



福建人民出版社

一 顆 紅 心

陳 蘭 琴 講 述

李 良 友 整 理

*

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

(福州河东路得貴巷18号)

福建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001号

福州第六印刷厂印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

*

开本787×1092 1/50 印張3/5 字数12,000

1960年4月第1版 1960年4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,700册

分类号: K279

統一书号: T 10104·251

定 价: (5) 六 分

日子象流水一样，不觉我已经度过七十多个年头了。七十多年，这不算个短的时间，但许多往事回忆起来，还仿佛象前几天才发生的一样。不少人都称赞我记性好。好什么，是旧社会带给我的苦难太多了；那么多的创伤，那么深的刻在心上，怎能忘却呢！

十岁离娘家

七十二年前，我出生在东溪。有道“穷人无大仔”，我十岁的时候，父亲已经五十多岁了。下边还有三个弟妹，连母亲全家六口，田无一丘，光靠一个五十多岁、饿得皮包骨的老人来租种一点地，怎么能养活六张嘴呢？生活逼得我父母做出了狠心的事情：托一个打铁师傅作媒，三十块钱把我卖到

广地来了。

記得那天早晨，母亲突然給我換了一身溫州改布做的新衣服；端來一碗米粉，上面還放了一個紅蛋，邊照應我吃着，邊摸着我的頭說：“妹子，今天打鐵師傅帶你去做親戚，你要乖乖的听话……”說着，說着，她眼圈霎時紅了，眼淚滴到我的臉上來。

那時候我到底是個小孩子，穿上新衣裳，快活死了。心想：“干嗎哭呢？做親戚還不好么？……”根本不理会其中的原因。吃罷米粉，把紅蛋往袋里一裝，真的就跟着蹦蹦跳跳地走了。……唉！誰知道做“親戚”做了一輩子。

旧社会讲的是“門風相对”。我夫家这边也是穷光蛋。你别以为他有錢討老婆，原来那三十块“聘金”，是“衰猪拉硬屎”，用高利向地主借来的。当时他一家三口：母亲和哥弟倆。我丈夫朱选新娶我的那年足足三十岁了。他哥哥还大他十多岁。为了傳种接代，这門親事，他們是拼着命干的。不是么？本来就是个剛够糊口的家庭，現在欠

了債，又增加了一張嘴，還有辦法生活嗎？

田沒法種了，選新只好跑到“上府”^①去當柴夫。家里人都指望他賺些錢米回來還債，免得受財主的气。我肚子餓還忍得住，那臭氣呀，實在受不了。可是，日盼夜盼，誰知道去了幾年，一片銅板沒撈到，結果害了一場大病，還得討飯回來。

從到朱家起，我就是有一頓沒一頓的過日子。開頭替人家看牛、放鴨，十四歲起就拿鋤頭挑糞桶下田了。然而不管你做牛做馬，債總是還不清。說起來怪可憐！直到我丈夫六十歲，累彎了腰板，躺在棺材里的时候，他的全部家當包起來還不够作枕头，可是還背着一身債。……

我是十八歲結婚的。頭兩胎都是女的，二十六歲那一年才養了男孩子作斌。窮人孩子多受罪呵！女兒沒有斷奶就抱給人家當童養媳了。我作斌他光景過的并不比姐姐強，一落地也是用破布包着；月

①上府指建甌一帶。

子里我喝的是地瓜糊，很快就沒有奶水了，餓得他整天哇哇叫。孩子是身上肉，看到他这样飢餓啼哭，你想我会多么难过，那哭声，就象針一样地刺痛了我的心。……

但是不管怎样，作斌他爹在世，家庭的担子总算有人頂着；死后，給我留下了一堆債和一个无知的孩子，那就更苦楚了。不过“老天”既然这样安排，又有什么办法？千斤重担只得挑起来。从此，从田头到灶尾，都得一个人管了。加上我这个旧脑筋：“不怕穷倒怕絕”，事情考虑得可长呢，顾虑孩子大了討不起老婆，还央求亲戚抱来个光会哭不会說話的童养媳，又給自己增加个“包袱”。就这样，大人和孩子一起受折磨。

我半飽半餓，起早摸黑地上山砍柴，下田种地。同志，受的苦楚不用說，穷人在旧社会里，連劳动的自由都沒有呵！唉！那时候女人干这样的活，那是被認為十分“丟臉”的事，沒有到山穷水尽，誰愿意干呀？当时那些地主婆就是把我当作“怪物”看待的。說我所以会这样，是因为“命带

十八敗”。提起来真气人！这些臭娘們，吸着我們
穷人的血汗，喂得白白胖胖的，打扮得一头花一面
粉，閑的发慌。就夏天拿把凉扇，冬天穿着皮袍，
抱个銅火籠，常常半倚着身子，站在門口寻开心。
老远見到我，就把鼻子捏起来，还划着臉笑我：

“快来看呀！一个女人家，也把褲管卷得老高，大
腿露露出。……”并且还誣蔑我做賊，說我到山头
地尾，不是偷挖番薯，就是偷拔菜。……

孩子呢？經常餓得哭哭啼啼，沒人照看，地主
仔又欺侮他們，加上跌呀碰的，身上經常是青一块
紫一块。……不过，虽說“穷人命賤”，但他們到
底都长大成人了。

参加革命

一九三二年，稻子黄尾的时候，我来到犀溪外
甥范义生^①家里。吃罢晚飯，聊了一陣，剛想去
睡，忽然有七、八个拿枪的人闖了进来。山里人胆

^①范义生同志曾任閩东紅軍独立师副师长，一九三五年冬作战
牺牲。

小怕事，我那穷孩子吓得一溜风往后門山跑去了。我后退几步，也想跟着躲开，却有一只粗大的手，把我胳膊拖住。回头一看，我愣住了。原来是我外甥范义生，他背着一条用紅帶子結起来的短枪。我奇怪得很，連忙問道：“你怎么也当起兵来了？”他没有馬上回答我，把我扶到房間里，叫我坐着，給我倒了一杯热茶，然后才笑嘻嘻地說：

“是呀，可是我当的这种兵是特別兵，他不是欺压老百姓的，而是給工人、农民办事的兵，所以它的名字叫工农游击队。我們要杀豪紳地主，把他們的田地財產沒收来分給穷人。……你是穷人嗎？”我心想，这还用問嗎？这个人真有意思，你又不是不懂，穷得都沒有褲子穿了，不是穷人还是財主？我点点头：“是穷人。”他接着說：“那就不用害怕，看到我們这种兵，應該很高兴才是。……”

說也奇怪，我这本来笨头笨脑的人，这些話語倒能听得理会。我馬上去把孩子叫了回来，并且答应愿意帮助游击队做些可以做的事情。

从此我的命运就紧紧地和革命連系在一起了。游击队叫我当交通，我孩子管财政，采买东西；范义生他們来开会，我就負責“望风”，游击队抓土豪，我就作“探子”。

干革命，我知道不是玩的事情，給反动派知道了，可要杀头。所以做起来是非常非常小心的。說“望风”吧，我曉得自己有爱打瞌睡的毛病——不，其实这也不能說是毛病，快五十岁的人呵，白天种田、煮飯，晚上还要洗衣服，累得骨头都要散了，还能不想睡吧？一打起瞌睡来，那自己就沒法管自己了。因此我怕誤事，就想了一个办法：把自己的头发拿几根綁在籬笆上。嘿，这法子真見效，一瞌睡，头就痛起来，“眠鬼”也就馬上給赶走了。“作探”呢？怕引起人怀疑，我就拿着一个竹箕，經常到各地去拾猪糞。……

可是尽管干得多么秘密，后来終于被狡猾的反动派发觉了。有一次，我探得准准的，游击队一来，就把本村土豪朱阿米三和朱选桂抓去了。誰知道一抓走，地主婆地主仔就找上門来，一把眼泪一

把鼻涕地纏着我：“你老人家行个好吧，帮忙求求情，把他放回来，我全家感恩不淺，一輩子都不会忘記你。我总会大大謝勞您阿婆。明天先給您老人家挑几担白米来。……”

我真是又急又气。急的是秘密露了，白匪迟早要来摧殘，担心革命要受損失；气的是反动派狗眼看人低，把我当作什么人。老实說，我人穷志不穷，別說几担白米，就是几担白銀也休想动我的心。我想起他們往日的威风，看着眼前那装着的一副可怜相，差一点要嘔吐了。心想：“你今天也会向我这个‘命带十八敗’的人乞求了！”恨不得搶白他一頓。为了怕因小失大，才把心头怒火压了下去。……后来这两个土豪給我們鎮压了，反动派也就更加仇恨我了。

仇恨是仇恨，反动派可不敢动我。一九三三年，革命搞得正热火，到处都是我們的“紅帶会”。整天号角“嘟嘟”响，紅艷艷的“紅帶”飄揚在各个山头。寿宁已經是共产党的天下了。地主、反动派哪里敢威风，躲在家唉声叹气，大門都

不敢跨出来，連寿宁县也一天到晚把城門关得紧紧的。离城門几步路的青菜、木柴，反动派都沒有胆量去拿。当时伪县政府沒柴煮飯，就把老百姓的房屋拆去燒火。后来“紅帶会”声势越来越大，伪县长叶鼎文吓得“烏紗帽”也不要了，一天夜里，用了一連匪兵保卫，偷偷地开了小差。……回想当时这些情景，我还会笑呢！

第一次被捕

但剛跨到一九三四年，寿宁又阴风惨惨，不見天日了。国民党看到革命那么厉害，发瘋了。派了什么浙江兵、教导团、保安团来“圍剿”。到处大燒、大搶、大杀，把我們革命同志杀害了，还要把头砍去，逼烈属拿二担谷去贖。那血腥罪行是講不完說不尽的。

国民党一进攻，地主反动派也开始翘起尾巴，兴风作浪了。广地以朱丁生为首的地主反动派，出来組織大刀会，要和革命作对头；强迫我孩子作斌也要参加。我母子是参加革命的人了，还能干这个

事情？当然不答应。你不参加他就抓你。“不参加大刀会的人，一定是‘土匪’。”反动派就是这样说的。看看在家里呆不住了，我就把孩子送去当游击队。

作斌走后，反动派就三天两天要人，每回都是捶墙撞壁，凶恶得象一群饿狼。我知道魔掌就要伸来了。果然，不久我就被捕了。

四月初的一天，太阳正含山，我吃罢晚饭刚想洗碗，反动派朱祖金的母亲慌头慌脑的闯进来，抖抖的说：“阿婆，我害怕游击队，夜里要和您搭铺。……”我心里明白“火鸡落厝^①，非灾则难”。真的，第二天清早，那臭婆娘一走，反动派朱祖金就带着十几个上着白晃晃刺刀的白匪冲进来了。

一进门，就劈面打了我几巴掌，痛得我耳朵嗡嗡叫，眼里冒火星；并且用棕索把我绑了起来——捆了起码有二十圈，接着就翻箱倒柜地大搜起来。

①火鸡落厝和灾星降临意思差不多，都是不祥之兆。

我被縛在柱子上，看得見，可動不了，心急得嘖嘖跳。別的沒有什麼，那些瓶瓶罐罐，要都拿去吧，反正沒有好東西。不巧的是，有二十塊打土豪的款沒有送走，還放在樓上籃子里，也許游擊隊正急著用呢？再就是擔心我那個剛出去挑水的媳婦，會盲撞回來。果然，那些畜生突然象豬叫一樣笑起來，存着的銀元被發現了；我那傻媳婦也撞回來給逮住了。我眼前一黑，差點昏過去。可是白匪搶光了值錢的東西，打壞了鍋和灶，抓到了人，正心滿意足嘻嘻哈哈的笑个不停。

我們被押送到當洋民團團部。反動派安下了黑心，婆媳兩人被隔離開了，我關在炮樓里。

當洋離廣地很近。民團狗怕我認得，做了一頂象城隍廟判官戴的帽子，連頭帶臉把我蒙住後，就拖着我去“過堂”。我說呀，反動派的心一定和平常人不一樣——不是黑的就是黃的，根本一點人性也沒有。沒有問，就拳打腳踢，槍柄木棍什麼都來，一下子先把我打昏死過去了。然後給倒了一盆冷水，讓我活過來後，這才開始逼供：“快說，游

击队有多少人，在哪里活动？接头站有几个，在什么地方？……”

我心想：“你们这些蠢货想错了，嘴长在我脸上，难道还能打出话来，我不说看你怎么办！”我死咬着“不知道！”的确，“疯狗”除了咬人外，别的再也没有作为。我在那里整整被关了二十四天，死去活来地被折磨了几十次。

这还不够。你猜把我媳妇另外关着做什么？原来反动民团头子整天去调戏她，想图谋去做小老婆。有一天这禽兽跑来对我说：“老婆子（本来都是叫我土匪婆），把媳妇嫁给我，马上就放你出去。你还可以得到一笔钱。……”你看这坏蛋是不是白天做梦。——当然，结果反动派什么也不会得到，一切的妄想都落空了。

最后反动派知道我实在没有希望，看看人也被折磨快断气了，就逼我女婿东借西贷了几十块银元去贖人。

花去了这么多的钱，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，如果当时让我晓得，那我绝对不会同意。我那里还象

个人呀！通常都说剩下一副骨头，我连骨头也被打断了好几根。既然到了这个地步，还花钱贖干什么呢？

家破人亡

回到家里一看，那景况更惨：门窗被砸粉碎了，墙壁七歪八倒，瓦片、垃圾扔个满地……整个屋子被毁了。我没有家了。我差点失声哭出来；后来狠狠地咬了一下嘴唇，才煞住，让眼泪往肚里流去。哭有什么用呢？要我哭给他们看，那是办不到的。

当天晚上，我婆媳两人就靠在那断墙旁边熬了一夜。第二天一早，就跌跌撞撞去城里接头找游击队。听说游击队在浙江太顺县活动，脚也没停，马上动身，讨着饭，艰难地向太顺走去。

我的讨饭生活就是从这里开始的。人说“做乞丐是走末路”；我不是反动派迫害，怎么会走这条“末路”呢！我会劳动，一件坏事没做，我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好人，万恶的国民党硬要把人逼成

“鬼”。我常在心里罵道：“蔣該死刮民党，你怎能不叫人民起来革你的命啊！”

回想当年，我还会心酸流泪。一路上看到的，都是凄凉景况：一片片田园，长着滿人高的荒草，整个整个的乡村被毀了，一座座住屋被燒了，有时几里路看不到烟火。……但是“烏龟壳”^①却到处都是。老百姓既然被反动派折磨到这样地步，还有什么施济呢？他們自己生活都沒法过！所以經常是村头到村尾，声音喊哑了，一口飯也沒有要到，而那些地主反动派的家又不敢去，因此只好忍飢挨餓，拣着小村走，采山薯、野菜填肚子。……

从寿宁到太順县只有七十里路程，我們足足走了一个月。千难万难来到了太順，到头来是“竹籃盛水一場空”。人生地不熟，那儿去找游击队呢？东找找、西寻寻，一点綫索也沒有。这时候我当真哭了。两个妇道人家，現在去找誰做主？同游击队失去联系，我好比断綫风筝。……沒奈何，只得又

^①指敌人的魔楼。

飄飄蕩蕩回到壽寧。后来考虑媳妇年青，随着飄蕩諸多不便，就把她寄在亲戚家里，剩下个我孤苦伶仃的“乞食婆”，到处飄泊，寻找亲人。

常言道：“禍不单行”；灾难接連临到我的头上来。六月間，我媳妇被反动民团团总搶走了。她誓死不从，剛剛由几家亲戚凑了几十块銀元贖回来，七月間，消息傳來，我孩子作斌被国民党杀害了。

当时我在乡下討飯。这惨痛的消息象一把斧头从我头上砍来，我馬上昏过去了。醒来后象个喝醉酒的人，头晕暈的，把个破籃子一扔就高一脚低一脚的向寿宁县城奔去。

太阳什么时候落山，月亮什么时候爬到当头，我都不知道；赶到弥陀堂刑場时，已經是深更半夜了。四周靜的怕人，只有一种什么虫象哭泣一样悲凉地叫着，月光惨白惨白的，我的整个心都破碎了，全身哆嗦起来，站也沒法站穩，就連爬帶跑地在广场寻找着孩子的尸体。因为泪水流得多，眼前一片模糊，从这一头爬到那一头，又从那一头爬到